

公众参与行为、社会阶层属性 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陈世香 周 维 吕志杰*

【摘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是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效果的直观感知，是其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也是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从公众主观感知视角切入，基于湖北省的一手问卷调查数据，论文采用 Bootstrap 方法分析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重点考察行政负担的中介效应和政府形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阶层属性对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均等化感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均等化感知之间、社会阶层属性和均等化感知之间均发挥着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增强公众参与行为和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服务需求的同时，也应降低行政负担和改善政府形象，以此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众参与行为 社会阶层属性 行政负担 政府形象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23) 05 - 0167 - 20

* 陈世香，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周维，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吕志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国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15AH007），湖北省思想库课题“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研究”（20200802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研究”（CDCM202205）。

一、问题的提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约翰·罗尔斯，2009）。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与实现是促进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公平配置的必要手段，也是推动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战略性要素（丁元竹，2022），更是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充分彰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中央和地方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既是“十四五”时期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亦将其作为公共服务发展的关键点予以强调。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通过对发展路径的安排，为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建立起了制度保障。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对提高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意义愈加重要。

在实践中，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向均衡发展迈进，但还存在可及性不高、供给不充分、供需不匹配、感知不满意等问题。这有悖于基本公共服务“机会均等”的要求，也影响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缪小林、张蓉，2022）。新时代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实现从“有机会享有”向“更多公平优质享有”、从“公共服务供给”到“满足人民需求”的转变（姜晓萍、郭宁，2020）。在这一目标下，公众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差异化感知显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在理论层面，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国内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种视角。供给侧角度的研究主要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出发，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客观水平的影响因素。其中，政府维度的研究多从公共财政体制和政府管理机制入手，研究财政层级、政府间事权划分、政府间收入划分、政府间转移支付、基层政区调整等变量的作用（谢贞发，2019；熊竞，2020），而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的加入也影响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然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客观水平与主观满意并非完全一致（陈娟、吴昊，2017），其形成也存在差异。仅关注客观水平无法体现基本公共服务以公众满意为目标的基本宗旨，更难以实现以公众偏好为核心的公共价值。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侧的研究应运而生。既有研究以公众评价为依据，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涵盖了宏观层面的财政制度、政策有效性等因素，以及微观层面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及政治面貌等属性特征（缪小林、张蓉，2022；龙立军、杨昌儒，2018）。但现有的相关研究仍无法避免将基本公共服务的使用与生产割裂，公众作为需求主体的重要作用未能

体现，同时也忽视了政府作为供给主体应承担的责任（范柏乃、金洁，2016）。

首先，吸收公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打破僵化的行政体系、摆脱行政资源限制以及提高公众满意度的重要举措。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均等化感知是一种主观认知，公众参与行为的不同会产生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效果（高勇，2014）。因此，本文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会产生何种影响。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的在于解决区域、城乡和群体间服务非均衡的问题，现实中不同社会阶层群体获得的基本公共服务仍存在明显差距（孙彩红，2019），且既有研究对社会阶层群体的均等化感知关注较少。因而，不同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机制也有待更为系统的考察。再次，公众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势必会与政府部门发生互动，行政负担是政民互动的核心要素（廖福崇，2022），故公众的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是否会通过行政负担影响均等化感知，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最后，以往研究多从政府内部的运作逻辑探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却忽视了政府形象等外部环境变量的作用。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注重点已从内部控制转向外部公众满意，政府形象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从更深层次看，若政府形象存在差异，那么对于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不同的公众而言，其均等化感知的变化程度或许也不尽相同。所以，政府形象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形成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本文试图回应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当前的政策导向、实践背景与研究基础，从公众主观感知的微观视角切入，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公众的参与行为及其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同时，分析行政负担和政府形象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湖北省的一手问卷调查数据进行验证。

二、理论建构与研究假设

（一）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和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其理论基础涉及庇古的社会福利思想、希克斯等学者的补偿原则思想、萨缪尔森等学者的社会福利函数以及帕累托最优定理等相关理论（尚虎平、张婵娟，2019）。在政治哲学领域，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均是其思想起源（范逢春，2016）。在我国

实务界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以及学术界深入开展相关主题研究的进程中，学者们大致形成了在保证公众享受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体现地区间差异的共识。但对“均等化”的概念认知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刘磊、许志行，2016）。目前，学界主要是从财政能力均等、机会均等、底线均等以及结果均等角度进行界定。其中，财政能力均等视角强调在政府间财政能力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人人可及；机会均等视角重点关注公众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机会；底线均等侧重在承认区域、城乡及群体之间存在差异的基础上，保障全体公众都享有一定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结果均等则强调公众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基本相当，重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果的客观水平和公众主观获得感知。

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提升公众获得感的必然要求。公众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均等化感知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依据既有研究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效果的直观感知（姜晓萍、康健，2020），强调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知（缪小林、张蓉，2022），是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王浦劬、季程远，2018）。而且，从公众视角展开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评价更能体现以公众偏好为核心的公共价值（范柏乃、金洁，2016）。公众既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者，通常也是合作生产者，有效的公众参与行为能够提供自下而上的感知反馈，助力以公众需求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顺利进行（杨三等，2022）。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能够使个体的基础性和差异化需求得以满足，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在现代社会，公众因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属性强调公众的社会经济地位，涉及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等层面（陈丽君等，2022），资源丰富的人处在较高的社会阶层，而资源稀缺的人则处在较低的社会阶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具有由低层次到高层次转变的需求。对于高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而言，其低层次的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因而更关注尊重或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对于低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来说，生理或安全需求的满足才是其主要目标（刘中起、瞿栋，2020）。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社会阶层越低的公众由于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可能会因为获得了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使自身需求得以满足而感到满意；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的再分配工具（李实、朱梦冰，2022），相比于低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而言，高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更容易对此持有消极态度

(曾昭携等, 2022)。此外, 加之我国累进税制的存在, 高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需缴纳更多的税收, 其拥有更多样化且更高水平的服务需求。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已不能满足高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现实需要, 进而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产生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 (Chen et al., 2017)。由此, 提出如下假设。

H2: 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直接负向影响。

(二) 行政负担的中介作用

行政负担是指公众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难以回避的成本 (马亮, 2019; Herd & Moynihan, 2018), 包括信息搜集成本、服从成本以及心理成本。其中, 信息搜集成本是指公众为了解办事流程和相关信息所承担的成本 (Fox et al., 2020),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表现为查找清单、材料及流程等付出的成本。服从成本是指公众为满足政府部门事项办理要求所需承担的成本 (廖福崇, 2022),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表现为公众准备和提交材料等付出的成本; 心理成本则强调公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承受的困惑、沮丧、焦虑等心理负担 (马亮, 2022),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体现为公众担心事项办理不畅而出现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主导, 公众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时会与政府发生互动。而政府作为官僚组织, 有可能会由行政体制僵化而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职责分工不明确等问题, 从而加重了公众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行政负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 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对政府机构和行政方式进行重塑, 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点。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传统行政负担, 但同时也衍生出了公共服务不均等、数字行政负担增强等问题 (郭金元、陈志霞, 2022), 导致部分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面临行政排斥, 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结果不公正以及算法歧视 (Lindgren et al., 2019), 最终降低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感知。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行政负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负向影响。

根据管理系统理论, 政府部门被视为“黑箱”。由于封闭式的决策机制以及较少的公众参与行为, 公众对政府“黑箱”的运作流程了解甚少 (吴建南等, 2008), 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则需承担更高的行政负担, 这进而产生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不过, 近年来, 政府部门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政策制定阶段, 强调贯彻执行需求导向和服务本位的公共行政精神, 确保公众获得更为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 (范柏乃、唐磊蕾, 2021)。与此同时,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发展完善，为公众参与行为的实现提供了渠道。在有效的参与机制将政府部门“黑箱”打开后，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认知更加全面，面对的行政负担也会相应降低（马亮，2019）。此外，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纽带，社会组织凭借其贴近公众及专业性强的优势，能够将公众的需求偏好信息更为有效地反馈给政府部门，精简了公众参与的繁琐流程（张邦辉等，2020），降低了公众的行政负担。公众作为理性经济人，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在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和享受服务时，面对差异化的行政负担，会产生不同的均等化感知效果。故而，提出假设如下。

H4：公众参与行为对行政负担具有负向影响。

H5：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正向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根据社会阶层理论，社会阶层属性会对个体的社会生活和心理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期处在高社会阶层的个体倾向于做出更具个性化的行为选择；而处在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其主观倾向和需求表达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做出与他人一致的选择（胡小勇等，2014）。相应地，对于社会阶层较高的公众来说，其对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若想切实享受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高社会阶层的公众势必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满足自身需求，其行政负担也会相应增强。而低社会阶层的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层次较低且保持更保守的态度，在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进程中，低社会阶层的公众通常享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更多关注。事实上，随着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和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张恒龙等，2013）。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底线均等以及全民覆盖。低社会阶层的公众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要投入的资源相对较少，面对的行政负担也较低。总之，不同社会阶层的公众拥有的社会资源和需求偏好差异较为明显，在面对不同的行政负担时，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也会存在异质性。既有研究也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会产生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吴翠萍，2013）。由此可见，社会阶层属性还通过行政负担的中介作用使公众产生差异化的均等化感知效果。因此，提出假设如下。

H6：社会阶层属性对行政负担具有正向影响。

H7：行政负担在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负向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三）政府形象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政府形象的塑造和改善逐渐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通过促进政府工作的合规化、标准化以及满足公众需求等方式加以实现。政府形象是政府实际行为和工作成果的总体表现和客观效应，以及公众对政府施政业绩和综合能力等的整体评价（高慧军、黄华津，2019）。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服务供给与以公众为核心的实际感知之间的博弈均衡过程（缪小林等，2020）。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观感知日益受到政府的关注，学术界也展开了诸多研究，但对政府形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关注度仍然不够（Maor & Sulitzeanu, 2016）。

既有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强调公众对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与主观期望之间的比较和权衡，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政府形象的影响（Brown, 2007）。拥有良好形象的政府机构会通过优化服务供给方式、精简服务流程以及提升工作人员服务效果等途径为公众提供便利，在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会对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积极影响（范柏乃、金洁，2016）。相反，形象受损的政府机构会使得公众的政治信任感降低，在恶化公众参与行为意愿的同时，也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感知态度。换言之，政府形象会影响公众参与行为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效果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8：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政府形象的改善和提升需要政府机构在提供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具备良好形象的政府机构会更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服务需要，倾听各方意见和建议，尊重不同社会阶层公众的利益诉求，从而不断提升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而存在形象危机的政府机构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改善公共服务方式等方面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差异化需求的关注度也会相应降低（孙其昂等，2016）。总之，政府形象会在不同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产生异质性影响。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9：政府形象在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政府形象是政府机构政治、经济资源以及其他无形资产的象征，是政府合法性和权威的重要来源，也是行政职能有效行使的重要保障。在公众参与兴趣不断提升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驱动下，拥有良好形象的政府机构会逐步形成

和完善多样化的公众参与途径和需求表达机制（范柏乃、金洁，2016），形成一体化、网络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综合平台，简化行政程序并减少行政拖延，对于公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行政负担具有一定的消减作用（Moon & Bretschneider, 2002）。而存在形象危机的政府机构可能会面临繁文缛节问题，造成政民的非良性互动，使得公众的行政负担不断增加（Moynihan et al., 2015）。因此，差异化的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行政负担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0：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行政负担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政府形象建设有助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平等主体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参与（孙其昂等，2016）。形象良好的政府机构能够贯彻落实平等一致的价值理念，履行兼顾不同社会阶层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进而降低不同社会阶层公众的行政负担。而形象受损的政府机构可能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价值理念贯彻落实不到位或行政人员执政方式欠妥等问题（唐土红，2016），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时的行政负担加重。换言之，政府形象的优劣有可能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在获取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付出不同程度的行政负担。故而，提出如下假设。

H11：政府形象在社会阶层属性和行政负担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以民生导向和公平优先为核心价值，以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根本目标，这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延伸至提升公众的均等化感知层面（缪小林、张蓉，2022）。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感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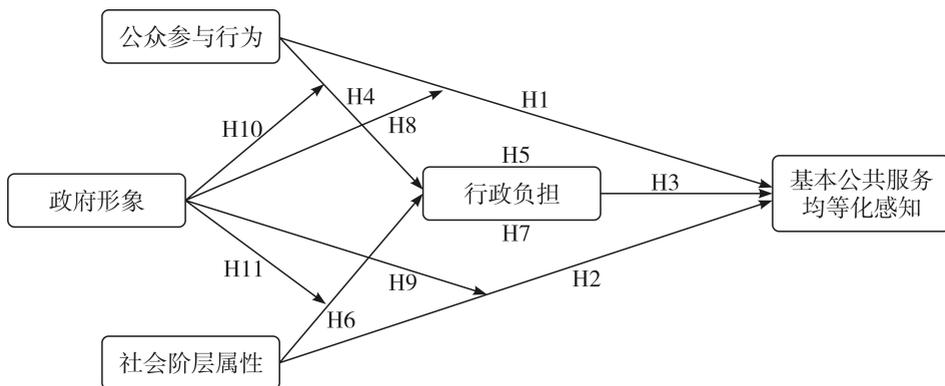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问卷发放

本文选取湖北省公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第一，既有研究大多立足宏观视角对全国或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差异性展开分析，而缺乏对具体省份的中观分析（范柏乃等，2015）。第二，由于湖北省内各个城市在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失衡矛盾突出（王雪晴、田家华，2021），而湖北省作为我国华中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对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对既有研究成果梳理和相关政策解读，本文的调研问卷得以设计完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受访对象。具体的抽样过程为：在每个城市随机选取2-3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随机选取2-3个社区，最后在每个社区随机选取10个受访者进行调研。课题组成员共发放问卷1300份。剔除填答“不清楚”“不了解”和空白数据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010份，问卷有效率为77.69%，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

特征	类别	数量	比例 (%)	特征	类别	数量	比例 (%)
性别	男	483	47.82	学历	初中及以下	85	8.42
	女	527	52.18		高中	203	20.10
年龄	25岁及以下	141	13.96		大专及本科	645	63.86
	26-35岁	448	44.36		研究生及以上	77	7.62
	36-45岁	240	23.76	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32	42.77	
	46-55岁	152	15.05	国有企业员工	116	11.49	
	56岁及以上	29	2.87	私营企业员工	253	25.05	
政治面貌	群众	457	45.25	职业	农民	44	4.36
	共青团员	177	17.52		军人	9	0.89
	共产党员	330	32.67		学生	37	3.66
	民主党派	14	1.39		离退休人员	17	1.68
	无党派人士	32	3.17		无单位/个体户	102	10.1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EQP）

分析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强调公众对所获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主观感受。本文将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评价作为因变量的测量方式，受访对象在 0 - 10 分之间进行选择，0 表示非常不满意，10 表示非常满意。借鉴缪小林等学者的做法（缪小林、张蓉，2022），将受访对象所选数值作为衡量其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感知水平。

2. 自变量：公众参与行为（PAR）和社会阶层属性（SOC）

参照马亮和杨媛（2019）等学者对公众参与行为的测量，本文根据公众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建言献策、平台使用以及问题反馈三方面的实际参与情况进行赋值。参与赋值为 1，未参与赋值为 0，并通过加总三项得分求平均值，作为公众参与行为的取值。

本文关注的社会阶层属性是指公众的客观社会阶层，参考既有研究做法（Tan & Kraus, 2015; Piff, et al., 2010），将受访者的月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取均值，得到其社会阶层属性分值。

3. 中介变量：行政负担（BUR）

借鉴 Moynihan 等人（2015）以及马亮和杨媛（2019）对行政负担的概念界定，本文对公众在获取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对工作人员友善程度、信息获取方便程度以及办事手续简洁程度三方面的满意度进行测量。受访对象在 0 - 10 分之间选择，0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根据研究需要对所选数值进行逆向赋值。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陈丽君等，2022），对上述三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 KMO 统计量的值为 0.717。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化原则进行因子正交旋转，结果显示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4.99%，且信度分析显示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31，说明测量行政负担的三个题项内部一致性较好，可归为一个变量。由此，对三个题项得分求均值，作为行政负担的最终得分。

4. 调节变量：政府形象（IMA）

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范柏乃、金洁，2016），本文从政府进取心和政府责任心角度对政府形象进行测量。其中，政府进取心体现在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程度方面的满意度，政府责任心体现在公众对诉求处理效果的满意度。受访对象在 0 - 10 分之间选择，0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信度分析显示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724，说明测量政府形象的题项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两个题项得分求均值，作为政府形象的

最终得分。

5. 控制变量：人口统计学特征

参考既有研究的做法（陈丽君等，2022），本文将可能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GEN）、年龄（AGE）、职业（CAR）及政治面貌（POL），其中性别、职业及政治面貌均以数字表示。

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核心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6.97%，低于 40%，故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本文还对核心变量进行效度检验，KMO 统计量的值为 0.917，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可进行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四、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本文运用 SPSS23.0 软件对核心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以此对研究假设进行初步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公众参与行为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阶层属性和行政负担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为后续的研究假设检验提供了一定依据。同时，经由对核心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的 VIF 值处于 1.016—1.074 之间，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描述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EQP	PAR	SOC	BUR	IMA
EQP	7.828	1.782	1				
PAR	0.747	0.278	0.289***	1			
SOC	-0.001	0.739	-0.064**	0.076**	1		
BUR	2.163	1.693	-0.782***	-0.390***	0.018	1	
IMA	7.790	1.774	0.739***	0.315***	-0.046	-0.805***	1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机制

1. 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感知的简单效应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2所示。与此同时,表4呈现了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主效应分析结果。其中,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p < 0.01$),主效应为1.765,置信区间为[1.451, 2.080],不包含0,达到了显著水平,假设H1成立。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p < 0.01$),主效应为-0.188,置信区间为[-0.322, -0.054],不包含0,达到了显著水平,假设H2成立。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程度大于社会阶层属性产生的影响。此外,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职业、政治面貌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均具有显著影响。

表3 简单效应分析

变量类别	变量名简称	EQP			BUR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控制变量	GEN	-0.113***	-0.096**	-0.003	0.129***	0.140***
	AGE	0.121***	0.104**	0.017	-0.139***	-0.130***
	CAR	-0.147***	-0.140***	-0.030	0.109***	0.156***
	POL	-0.067**	-0.055*	-0.011	0.075**	0.070**
自变量	PAR		0.279***		-0.377***	
	SOC		-0.090***			0.017
中介变量	BUR			-0.775***		
R ²	0.042	0.122	0.610	0.193	0.052	
F	11.952***	24.297***	317.145***	49.197***	12.123***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0.01、0.05和0.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4 行政负担的中介效应分析

	行政负担	Effect	SE	t	LLCI	ULCI
	主效应	1.765	0.191	9.237***	1.451	2.080
PAR→EQP	直接效应	-0.127	0.138	-0.922	0.357	-0.353
	中介效应	1.892	0.156		1.640	2.148

(续上表)

	行政负担	Effect	SE	t	LLCI	ULCI
SOC→EQP	主效应	-0.188	0.082	-2.303**	-0.322	-0.054
	直接效应	-0.155	0.052	-2.992***	-0.241	-0.070
	中介效应	-0.033	0.087		-0.165	0.125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N = 1010，Bootstrap = 5000，LL = 上限，CI = 置信区间，UL = 下限，为 90% 置信区间，***、** 和 *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 行政负担的中介作用

本文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方法从样本中重复抽样，检验力高于传统的 Sobel 方法 (Hayes & Scharkow, 2013)，且不像 Sobel 法要求检验统计量服从正态分布，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中介效应分析 (温忠麟、叶宝娟, 2013)。本文运用 PROCESS 程序对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 Bootstrap 分析，抽样次数为 5000，置信区间为 90%。由表 3 中模型 3 的分析结果可知，行政负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p < 0.01$)，假设 H3 成立；由表 3 中模型 4 的分析结果可知，公众参与行为对行政负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p < 0.01$)，假设 H4 成立。同时，由表 4 可知，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1.892，置信区间为 [1.640, 2.148]，不包含 0，达到了显著水平。而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直接效应为 -0.127，置信区间为 [0.357, -0.353]，包含 0，未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发现，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H5 成立。

此外，由表 3 中模型 5 的分析结果可知，社会阶层属性对行政负担的影响并不显著 ($p > 0.1$)，假设 H6 不成立。而由表 4 可以发现，行政负担在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0.033，置信区间为 [-0.165, 0.125]，包含 0，未达到显著水平；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直接效应为 -0.155，置信区间为 [-0.241, -0.070]，不包含 0，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知，行政负担在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不具有中介作用，假设 H7 不成立。

3. 政府形象的调节作用

本文参考黄静等 (2014) 的做法，基于 PROCESS 程序并运用 Bootstrap 方

法，对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首先，公众参与行为和政府形象的交互项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p < 0.1$)，加入交互项的 R^2 达到显著水平 ($p < 0.01$)。结合前文分析发现，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假设 H8 成立。其次，社会阶层属性和政府形象的交互项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p < 0.01$)，加入交互项的 R^2 同样达到显著水平 ($p < 0.01$)。结合前文分析发现，政府形象在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重要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 H9 成立。

表 5 政府形象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名简称	EQP				BUR			
	Coeff	SE	Coeff	SE	Coeff	SE	Coeff	SE
GEN	-0.013	0.069	0.010	0.069	0.177**	0.062	0.177***	0.065
AGE	0.001	0.004	-0.001	0.004	-0.007**	0.003	-0.006*	-0.004
CAR	-0.014	0.012	-0.020	0.013	0.018	0.011	0.021*	0.012
POL	-0.016	0.033	-0.006	0.033	0.052*	0.030	0.051	0.031
PAR	-0.080	0.135			-0.894***	0.119		
SOC			-0.084	0.052			-0.035	0.049
BUR	-0.572***	0.035	-0.575***	0.034				
IMA	0.318***	0.032	0.311***	0.032	-0.706***	0.019	-0.755***	0.018
PAR × IMA	0.127*	0.076			0.073	0.060		
SOC × IMA			0.062***	0.023			0.035	0.022
R^2	0.649	0.652	0.674	0.654				
F	205.148***	208.072***	295.862***	270.824***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0.01、0.05和0.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根据表 5 的分析结果还可以发现，公众参与行为和政府形象的交互项、社会阶层属性和政府形象的交互项对行政负担的影响均不显著 ($p > 0.1$)，假设 H10 和假设 H11 均不成立。

综上所述，本文验证了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主效应，并且发现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同时，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均具有调节效应。具体作用机制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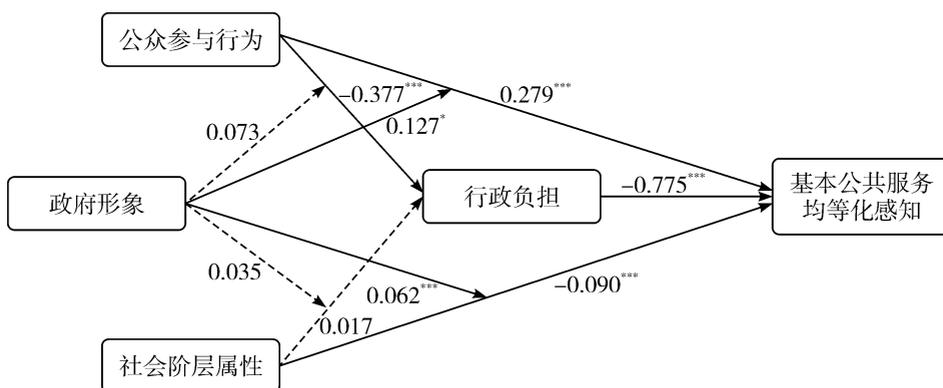


图2 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作用机制

五、结论与讨论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历了从理念到制度安排的蜕变。随着政策环境和公众偏好的演变，过去仅追求“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群众满意”和“服务质量”日渐成为更重要的评价标准（杨波，2019）。经由文献回顾和逻辑推演，本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为主要研究变量，并提出了影响其生成的理论模型，进而借助以湖北省为对象的问卷调查数据验证了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的主效应，以及行政负担的中介作用和政府形象的调节效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是对于政府实践的社会认知的重要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可以被视为政府管理实践的另一种表现，透视其形成机理对政府政策、管理行为的优化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第一，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作用显著。首先，公众参与行为正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的重要手段，这与既有研究的结论相一致（郑建君、赵东东，2019）。其次，社会阶层属性负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本研究中社会阶层属性聚焦于公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而言，处于较高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具有更为消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这也印证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公共服务的评价越低的相关研究结论（刘中起、瞿栋，2020）。这一结论也恰恰表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契合了社会阶层属性较低公众的基本需求，维护了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发挥着保障民生的重要功能，也有利于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实现。

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主观感知与评价的既有研究关注了公众参与行为和社

会阶层属性的作用，而本文的贡献在于探索了公众的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显著影响。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也揭示了性别、年龄、职业、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所发挥的显著作用。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发展瓶颈很大程度上缘于供给困境，而对公众真实需求的考量不足正是供给困境的重要原因（王玉龙、王佃利，2018）。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提高公众在基本公共服务决策和供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差异化回应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多元化的需求，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和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渠道。

第二，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这表明，增强公众参与行为有利于降低行政负担，而行政负担的降低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公众参与行为和行政负担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政民互动水平，高质量的政民互动会带来更加正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关系的发生机制，也丰富了行政负担相关研究成果。其政策实践启发意义在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不仅需要为公众提供广泛的参与途径，还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满足公众需求，减少繁文缛节，降低公众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行政负担。

第三，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在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在良好的政府形象下，同等参与水平的公众将产生更为积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相同的社会阶层属性会带来更高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这也进一步明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生成机制。同时，政府形象包含公众对政府业绩和能力的综合评价，构成政府的潜在资源与无形资产，正面的政府形象会带来较高的公众认同与支持（于洋航、陈志霞，2019）。因此，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与量，建立和维护良好的政府形象，也构成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的重要方向。

本文立足中国情境，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形成的前置条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具体而言，本文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衡量较为单一，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多维度对其进行更为充分、全面的测量。此外，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前置变量是相当丰富的，还可能存在其他重要变量有待挖掘和验证，从而更为系统地明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提升方向。最后，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同，公众的感知情况可能也存在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纳入更多的省份，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在更大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差异及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 陈娟、吴昊 (2017).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众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学术探索*, 4: 46 - 51.
- Chen, J., & Wu, H. (2017).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Satisfaction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Academic Exploration*, 4: 46 - 51. (in Chinese)
- 陈丽君、胡晓慧、顾昕 (2022). 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 ——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公共行政评论*, 1: 148 - 170 + 199 - 200.
- Chen, L. J., Hu, X. H., & Gu, X. (2022). How Does 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 and Expectation Affect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Mediate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the Moderate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 148 - 170 + 199 - 200. (in Chinese)
- 丁元竹 (2022).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5: 4 - 13.
- Ding, Y. Z. (2022).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for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Frontiers*, 5: 4 - 13. (in Chinese)
- 范柏乃、傅衍、卞晓龙 (2015).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及空间格局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华东经济管理*, 1: 141 - 147 + 174.
- Fan, B. N., Fu, Y., & Bian, X. L. (2015). An Analysis on Eq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Patter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Evidenc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1: 141 - 147 + 174. (in Chinese)
- 范柏乃、金洁 (2016). 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机理——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与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 *管理世界*, 10: 50 - 61 + 187 - 188.
- Fan, B. N., & Jin, J. (2016).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on Perceived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Imag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10: 50 - 61 + 187 - 188. (in Chinese)
- 范柏乃、唐磊蕾 (202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运行机制、政策效应与制度重构. *软科学*, 8: 1 - 6.
- Fan, B. N., & Tang, L. L. (2021).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perating Mechanism, Policy Effect,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Soft Science*, 8: 1 - 6. (in Chinese)
- 范逢春 (2016). 建国以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1: 46 - 57.
- Fan, F. C. (2016). A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Equaliza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A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1: 46 - 57. (in Chinese)
- 高慧军、黄华津 (2019). 新时代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优化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6: 16 - 21.
- Gao, H. J., & Huang, H. J. (2019).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6: 16 - 21. (in Chinese)
- 高勇 (2014). 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 *社会学研究*, 5: 98 - 119 + 242 - 243.
- Gao, Y. (2014). Pattern Identifica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Sociological Studies*, 5: 98 - 119 + 242 - 243. (in Chinese)
- 郭金元、陈志霞 (2022). 信息技术治理繁文缛节的二元悖论及其反思. *电子政务*, 4: 101 - 113.
- Guo, J. Y., & Chen, Z. X. (2022). The Binary Paradox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overnance Red Tape and Its Reflection. *E-Government*, 4: 101 - 113. (in Chinese)
- 胡小勇、李静、芦学璋、郭永玉 (2014).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心理科学*, 6: 1509 - 1517.
- Hu, X. Y., Li, J., Lu, X. Z., & Guo, Y. Y. (2014).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1509 - 1517. (in Chinese)
- 黄静、朱丽娅、周南 (2014). 企业家微博信息对其形象评价的影响机制研究. *管理世界*, 9: 107 - 119.
- Huang, J., Zhu, L. Y., & Zhou, N. (2014).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 Microblog Information on Their Image Evalu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9: 107 - 119. (in Chinese)
- 姜晓萍、郭宁 (2020).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与演化规律——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策的文本分析.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6: 33 - 42.
- Jiang, X. P., & Guo, N. (2020). Policy Objectives and Evolution of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Level Polic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6: 33 - 42. (in Chinese)
- 姜晓萍、康健 (2020). 实现程度: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的新视角与指标构建. *中国行政管理*,

- 10: 73 - 79.
- Jiang, X. P., & Kang, J. (2020). Realization Degree: A New Perspective for Evalu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Equalization and Its Composite Indicator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 73 - 79. (in Chinese)
- 李实、朱梦冰 (2022).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管理世界*, 1: 52 - 61 + 76 + 62.
- Li, S., & Zhu, M. B. (2022).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1: 52 - 61 + 76 + 62. (in Chinese)
- 廖福崇 (2022). 政务能力如何提升营商环境质量? ——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证据[J]. *宏观质量研究*, 2: 113 - 128.
- Liao, F. C., (2022). Government Service Ability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 2: 113 - 128. (in Chinese)
- 刘磊、许志行 (2016).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辨析.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4: 55 - 62.
- Liu, L., & Xu, Z. X. (2016). The Concept Analysis of the “Equalization” in Basic Public Service.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4: 55 - 62. (in Chinese)
- 刘中起、瞿栋 (2020). 社会阶层、家庭背景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实证分析.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4: 93 - 100.
- Liu, Z. Q., & Qu, D. (2020). Social Class, Family Background, and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GSS2015 Data.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4: 93 - 100. (in Chinese)
- 龙立军、杨昌儒 (2018). 西部多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因素——以贵州民族地区调查数据为例. *社会科学家*, 11: 58 - 62.
- Long, L. J., & Yang, C. R. (2018).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Western Multi-ethnic Areas: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Guizhou Minority Areas as an Example. *Social Scientist*, 11: 58 - 62. (in Chinese)
- 马亮 (2019). 政务服务创新何以降低行政负担: 西安行政效能革命的案例研究.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 4 - 11 + 126.
- Ma, L. (2019). How Can Government Service Innovation Reduce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A Case Study of Xi'an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Revolution.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 4 - 11 + 126. (in Chinese)
- 马亮 (2022). 行政负担: 研究综述与理论展望.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1: 4 - 14 + 124.
- Ma, L. (2022). Administrative Burdens: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1: 4 - 14 + 124. (in Chinese)
- 马亮、杨媛 (2019).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公众满意度? ——面向中国地级市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 *行政论坛*, 2: 86 - 94.
- Ma, L., & Yang, Y. (2019). How Doe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ffect Citizen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Administrative Tribune*, 2: 86 - 94. (in Chinese)
- 缪小林、张蓉 (2022). 从分配迈向治理——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 *管理世界*, 2: 129 - 149 + 9 - 14.
- Miu, X. L., & Zhang, R. (2022). From Distribution to Governance: Equalization Transfer Payment and Perception of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 129 - 149 + 9 - 14. (in Chinese)
- 缪小林、张蓉、于洋航 (2020).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 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到“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中国行政管理*, 2: 67 - 71.
- Miu, X. L., Zhang, R., & Yu, Y. H. (2020). Governance of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From “Narrowing the Financial Gap Between Regions” to “Enhancing the Sense of People's Acces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67 - 71. (in Chinese)
- 约翰·罗尔斯 (2009). 正义论.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Rawls, J. B. (2009). *A Theory of Justice*. (He, H. H., He, B. G., & Liao, S. B. 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in Chinese)
- 高虎平、张婵娟 (2019). 国内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评估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演进趋势——基于 WOS、CNKI 数据共现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理论探讨*, 6: 156 - 164.
- Shang, H. P., & Zhang, C. J. (2019).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Evolution Trend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earch on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t Home and Abroad: Visual Analysis of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Based on WOS and CNKI Dat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6: 156 - 164. (in Chinese)
- 孙彩红 (2019). 基本公共服务结构性分析与供给侧改革路径. *云南社会科学*, 1: 43 - 48 + 69.

- Sun, C. H. (2019). Structural Analysi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Supply-Side Reform Path.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1: 43 - 38 + 69. (in Chinese)
- 孙其昂、屈群苹、孙旭友 (2016).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形象构建.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13 - 18 + 146.
- Sun, Q. A., Qu, Q. P., & Sun, X. Y. (2016). Management of the Image of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13 - 18 + 146. (in Chinese)
- 唐土红 (2016). 基于行政伦理的政府公信力构建. *理论探索*, 1: 32 - 37.
- Tang, T. H. (2016).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Ethic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1: 32 - 37. (in Chinese)
- 王浦劬、季程远 (2018).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 *中国行政管理*, 1: 6 - 12.
- Wang, P. Q., & Ji, C. Y. (2018). Relative Acquisition in Transitional Society: Measurement, Change and Compariso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 6 - 12. (in Chinese)
- 王雪晴、田家华 (2021). 湖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 *统计与决策*, 23: 81 - 85.
- Wang, X. Q., & Tian, J. H. (2021). Measurement of Equalization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Hubei Province. *Statistics & Decision*, 23: 81 - 85. (in Chinese)
- 王玉龙、王佃利 (2018). 需求识别、数据治理与精准供给——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之道. *学术论坛*, 2: 147 - 154.
- Wang, Y. L., & Wang, D. L. (2018). Demand Identification, Data Governance and Precise Supply: The Approach to Supply-Side Reform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cademic Forum*, 2: 147 - 154. (in Chinese)
- 温忠麟、叶宝娟 (2013).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5: 731 - 745.
- Wen, Z. L., & Ye, B. J. (2013).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731 - 745. (in Chinese)
- 吴翠萍 (2013). 公共服务的阶层差异化认同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2: 100 - 103.
- Wu, C. P. (2013). Research on Differentiated Class Identity in Public Servic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100 - 103. (in Chinese)
- 吴建南、李贵宁、侯一麟 (2008). 财政管理、角色定位与组织绩效——不同资源禀赋下西部某市乡镇政府的经验研究. *管理世界*, 12: 64 - 74 + 82.
- Wu, J. N., Li, G. N., & Hou, Y. L. (2008). Financial Management, Role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Township Government in Western China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12: 64 - 74 + 82. (in Chinese)
- 谢贞发 (2019).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中的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综述与展望. *南京社会科学*, 5: 27 - 33.
- Xie, Z. F. (2019). On the Reform of Fiscal System to Promote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5: 27 - 33. (in Chinese)
- 熊竞 (2020). 基层政区治理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以上海基本管理单元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4: 21 - 29.
- Xiong, J. (2020).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Mechanism Between the Basic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the Basic Management Unit in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4: 21 - 29. (in Chinese)
- 杨波 (2019). 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演进特征与变迁逻辑——基于2006 - 2018年政策文本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 5: 196 - 202.
- Yang, B. (2019).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 Logic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from 2006 to 2018.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196 - 202. (in Chinese)
- 杨三、康健、祝小宁 (2022). 基本公共服务主观绩效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理——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与获得感的调节效应. *软科学*, 1 - 11.
- Yang, S., Kang, J., & Zhu, X. N. (2022).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erceived Performanc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Local Government Tru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Sense of Gain. *Soft Science*, 1 - 11. (in Chinese)

- 于洋航、陈志霞 (2019). 公共服务可达性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28 - 37.
- Yu, Y. H., & Chen, Z. X. (2019). The Impact of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Service on Political Trust and Its Mechanism.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28 - 37. (in Chinese)
- 曾昭携、白洁、郭永玉、张跃、顾玉婷 (2022). 越富有越不支持再分配? ——社会阶层与再分配偏向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6: 1336 - 1349.
- Zeng, Z. X., Bai, J., Guo, Y. Y., Zhang, Y., & Gu, Y. T. (2022). Are Richer People Less Supportive of Redistribu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Redistribution Preference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1336 - 1349. (in Chinese)
- 张邦辉、李丹姣、蒋杰 (2020).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公众需求表达机制探究. *改革*, 5: 139 - 149.
- Zhang, B. H., Li, D. J., & Jiang, J. (2020). Research on Public Demand Expression Mechanism in Government Purchase of Public Services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Reform*, 5: 139 - 149. (in Chinese)
- 张恒龙、毛雁冰、秦鹏亮 (2013). 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与成效.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96 - 110.
- Zhang, H. L., Mao, Y. B., & Qin, P. L. (2013). The Policies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a's Public-Service Equaliza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96 - 110. (in Chinese)
- 郑建君、赵东东 (2019). 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条件——基于江苏、贵州两省的实证分析.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 1: 72 - 80.
- Zheng, J. J., & Zhao, D. D. (2019).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and Conditions of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Jiangsu and Guizhou.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72 - 80. (in Chinese)
- Brown, T. (2007). Coercion Versus Choice: Citizen Evaluations of Public Service Quality across Methods of Consump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7(3): 559 - 572.
- Chen, L., Huang, J., & Li, J. J. (2017).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Services, and Inequality Under the Hukou System.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2(1): 377 - 394.
- Fox, A. M., Stazyk, E. C., & Feng, W. (2020). Administrative Easing: Rule Reduction and Medicaid Enroll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0(1): 104 - 117.
- Hayes, A. F., & Scharkow, M. (2013). The Relative Trustworthiness of Inferential Tests of the Indirect Effect in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0): 1918 - 1927.
- Herd, P., & Moynihan, D. P. (2018). *Administrative Burden: Policymaking by Other Mea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indgren, I., Madsen, C. Ø., & Hofmann, S., & Melin, U. (2019).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Digital Ki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6(03): 427 - 436.
- Maor, M., & Sulitzeanu-Kenan, R. (2016). Responsive Change: Agency Output Response to Reputational Threat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6(1): 31 - 44.
- Moon, M. J., & Bretschneider, S. (2002). Does the Perception of Red Tape Constrain IT Innovativeness in Organizations? Unexpected Results from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2(2): 273 - 291.
- Moynihan, D., Herd, P., & Harvey, H. (2015). Administrative Burden: Learning, Psychological, and Compliance Costs in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5(01): 43 - 69.
- Piff, P. K., Kraus, M. W., Cô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 - 784.
- Tan, J. J. X., & Kraus, M. W. (2015). Lay Theories about Social Class Buffer Lower-Class Individuals Against Poor Self-Rated Health and Negative A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3): 446 - 461.

责任编辑：张雪帆